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

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斗争！

托洛茨基主义 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分析

本文译自《工人先锋报》第874号(2006年8月4日)和第875号(2006年9月1日)

* * *

两年前，两位美国左翼知识分子，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以据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作出了严厉和彻底的谴责。他们的文章《中国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最初发表于《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04年7月-8月)，并随后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在文中，两位作者特别把那些将中国视为可以替代由美帝国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定的、蹂躏了众多欠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构造改革”的一个成功经济发展模式的“进步”知识分子，作为批评的对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写道：“我们不仅不苟同那些认为无论社会主义与否，中国是一种发展模范的进步人士；我们还认为，他们确立这一立场的过程，更突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进步群体普遍地丢弃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所不能苟同的“进步人士”中便包括维克托·利皮特(Victor Lippit)。利皮特及其同道在《批判的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 Studies*)2005年第3期(总第37卷)中，发表了回应《中国与社会主义》的批评文章。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进而写了一篇冗长的答复，回应利皮特等人的批评。(见《批判的亚洲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37卷)

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利皮特，尽管对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有一些左的批评，基本上是支持这项政策的。例如，他以“可耻”来谴责中国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尤其在农村的恶化。利皮特希望北京当局在保健事业、教育和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上投入比现在远远更多的资源，哪怕以短期内降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为代价。尽管如此，利皮特是明确地看涨中国的，他引用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一项研究报告，推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41年超越美国。

不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两人同利皮特之间存在多少的分歧，他们双方的论点都是建立在一些共同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他们不但错误地断言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还认为这样的结局是无可避免的。对利皮特来说，中国要持续和进一步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才能实现现代化。他宣称：“资本主义在完成其历史角色之前，是不能被取代的”，并补充说“欧洲大陆形式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大概是目前可行的最好制度。”对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来说，在中国或其它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纲领(他们将这种纲领和“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这个混淆不清的公式等同起来)，都必须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腐蚀人心的种种罪恶有很少或没有贸易交往。

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双方都否定了在任何历史上有意义的时期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利皮特对此是毫不含糊的，而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则含蓄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全球一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内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展望，是处于争论双方的概念范围之外的。然而，这个同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教条相对立的纲领，正是通往中国工农大众全面解放的**唯一**道路。

今日中国的神话和现实

邓小平领导的中共政权，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数年实行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这政策包括对外开放，并随后吸引了大量集中在制造业的西方、日本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的直接资本投资。主流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常用中国予人深刻印象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增长，为说明市

Defend Chinese Deformed Workers State!
For Proletarian Political Revolution!
China's "Market Reforms": A Trotskyist Analysis
(reprinted from *Workers Vanguard* Nos. 874 and 875, 4 August 2006 and 1 September 2006) 2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reprinted from *Spartacist* (English edition) No. 59, Spring 2006) 28

编辑启事

为了更好地表达本刊名称的来源——我们对德国斯巴达克派领袖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认同——我们决定更改“Spartacist”一词的翻译。

因此，从本期开始，本刊刊名将从《斯巴达克思》改为《斯巴达克派》。同时，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各国支部的中文名称，亦分别改为“斯巴达克同盟”、“斯巴达克小组”和“斯巴达克工人党”。

向第四国际的再生前进！

2007年5月

AP

China Labour Bulletin

2002年4月，胡锦涛访问华尔街。右: 2004年，西安天王纺织厂工人在工厂私有化后进行了长近七个星期的罢工反对香港老板。

场驱动的经济制度比集中计划的公有经济(他们将之贬称为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优越的实证。而利皮特则代表了一部分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以显著的国有经济和国家对整体经济进行管理为基础的、成功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的首要例证。

后一种观点的价值，在于以它自己的方式，承认了1949年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的核心成分，至今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国有企业在战略性工业部门，例如钢铁、有色金属、重型机械、电讯、电力和石油提炼中，仍占有主导地位。土地国有防止了支配农村社会的、大规模农业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大部分在外资部门以外产生的经济剩余，流入国有银行和国库。北京当局至今对金融系统的有效控制，使中国得以免受大起大落的投机性货币资本的危害。这种投机性货币资本，时而对从东亚到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新殖民地各国进行大肆破坏。

现在，世界各地代表政治舞台上所有派别的人物，从中共当局的发言人到华尔街的分析家，宣称中国已经在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叶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道路上大步前进的说法已是司空见惯的事。首先，这种观点忽视了在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关系里，中国经济的脆弱性。这种观点同时也忽视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统治阶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革命中诞生的官僚化畸形工人国家——不可调和的敌视。更有甚者，这种观点无视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不稳定性**：中共官僚苛政的种种后果，已引发了大量和增长中的社会抗议。

过去几年来，中共当局推行的经济策略的目标是维持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这使中国掌握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这在美国统治阶级的圈子里逐渐地增加了实行反华经济保护主义的压力。无论如何，美国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不论美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或实行反进口保护主义措施，甚至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都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工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为出口市场生产的外资、合资和私营中国公司，以及一些国有企业，将被迫大量减产、裁撤工人和白领职工。这将为整个中国经济带来强烈的衰退效应。

最近，中国着手开放银行业，容许外资得到部分所有权。如果华尔街、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家们能相当实在地控制中国的金融部门，其经济效果很可能是十分严重的。部分债台高筑的大型国有企业将被迫减产裁员；甚至大量货币资本的突然外流(像在1990年代末触发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一样的)，也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

按主流资产阶级舆论的看法，中国不是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就是在迅速和不可逆转地走向复辟。然而，就像在前苏联一样，资产阶级反革命必须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层面获胜，即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完成——这不是单单通过国内外资本控制的私营经济在数量上的扩张所能做到的。以美国统治阶级为核心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对这一点是十分了解的。因此美英两国政府公开支持资本主义据点香港的激烈反共党派和势力：这个英国前殖民地(还有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共唯一没有垄断政治权力和组织的地方。美国的统治者亦因此不厌其烦地表示中国需要“政治自由化”。

帝国主义者为了将1991-92年苏联的反革命毁灭在中国重演，致力于助长一股主要以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和中共官僚以及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技术官僚阶层中那些同国内外资本有紧密关联的成分为基础的，反共的政治反对力量。

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一直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试图以美军设施包围中国，并于去年与日本签订共同保卫资本主义重镇台湾(其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有相当多的投资)的协定。五角大楼一直在积极谋取在美国发动先发核进攻时抵消中国少量核武的能力——华盛顿的布什一伙公开宣布了这一战略。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主张无条件军事保卫中国和其它现存的官僚畸形工人国家——北朝鲜、越南和古巴——反抗帝国主义攻击和资本主义反革命。我们特别支持中国和北朝鲜测试和拥有核武器，掌握抵御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所必需的威慑力量。

尽管，也部分归咎于其迅猛的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增长，中国已是各种大众不满鼎沸的社会。队伍庞大和战略上拥有巨大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面对的，是一个赤裸裸和日益地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社会。作为其市场导向改革的一部分，北京斯大林主义当局在当前财政空前充裕、足以满足中国劳动人民的基本需要时，却使公共保健和基础教育缺乏经费。国有企业裁员，雇主拖欠工资、退休金和各项津贴，以及其它类似的侵权行为，引

起了广泛和不断发生的工人抗争。农村充斥着农民的愤怒抗议，反对中共地方官员没收土地从事地产投机，这些抗议频繁地造成了农民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现在，当权的官僚层清楚地分为三派：一派希望经济“改革”以同样的强度继续下去；另一派希望加强国家干预控制市场化的恶果，并由此扼杀社会不满；而第三派则期望恢复官僚的计划经济。迟早——很可能在官僚层内部及其周围的资产阶级分子采取行动消除中共的政治权力之时——中国社会里多重的爆炸性社会压力将粉碎执政官僚层的政治架构。到时，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命运将会被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资本主义奴役，被帝国主义征服。

我们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扫除专制和寄生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建立一个以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农委员会（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在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政府将重新建立包括国家对外贸垄断制在内的、集中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制度。经济将不再被闭关自守的官僚层武断的“行政指令”所操纵(造成像1950年代毛泽东的“大跃进”那样的灾难)，而会由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来管理；它将剥夺中国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的财产，并为中国劳动人民的利益重新谈判外国投资的条件：例如，坚持外资企业必需至少给予工人与国有部门同等的劳动条件。中国的革命工人政府将在大规模机械化和科学的农场经营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的自愿集体化：而中国需要从经济先进国胜利的工人革命得到大量的物质援助，才能实现这项事业。

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深深地震撼全世界。它将粉碎自苏联被摧毁以来，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宣传的“共产主义已死”的意识氛围。它将使东亚工业强国和帝国主义霸主日本的无产阶级激进化；激发朝鲜革命再统一的斗争(在被围困的北方进行政治革命，在资本主义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南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深受帝国主义紧缩政策折磨的群众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最终，只有在国际范围内，特别在北美、西欧和日本帝国主义核心国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中国才能作为社会主义亚洲的一部分而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为了为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提供必需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力于重新锻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

经济发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两人同利皮特之间的主要分歧，并不围绕在对中国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时期里，转变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事实上的评价。当然，他们在这方面是有一些重要的分歧：例如脱贫人口的数目。但从根本上区分双方的，可以说是一种不同的价值等级制度。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将平均主义和社群价值置于生产力的发展之上，而完全无视后者是从贫困和繁重劳动中解放人类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在对利皮特的回复中主张：“中国在主流发展标准(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和出口额)上的成功，不但完全没有在人类福利的战线上创造实际或潜在成功的条件，还可能损害了大部分中国劳动人民的人类发展的条件。”

同利皮特、或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一样，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相信当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正在驱使(以商品和服务的增加来计算的)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以私人利润积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民族国家制度，是限制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桎梏的认识是完全相反的。半殖民地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群众深刻和恶化中的贫困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里昂·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帝国主义间竞争复苏，并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解释道：

> “资本主义之为一世界系统已过了时。它已不能实践其主要的使命：增加人的能力与人的财富。人类不能停止于已达到的水平。只有生产力强有力的增加和健全的、计划的即社会主义的组织生产和分配，才能保障人类——全人类——体面的生活标准，同时赋予他们驾驭自己的经济活动的宝贵自由。这种自由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人将不再被迫用一生大部份时间致力于体力劳动。第二，他将不再依赖于市场法则……
>
> “技术将人从地、水、火、风这些古老原素的专制下解放出来，结果只是将他隶属于自己(技术)的专制之下。人不做自然的奴隶了，却做了机器的奴隶，更坏的是做了供给与需要的奴隶。现在的世界危机特别悲剧地证明：能下沉海洋之底，能上升到平流层的高空，能在电波上与两极的人作谈话的人，这骄傲而勇敢的自然之主宰者，仍是他自己的经济的盲目力量之奴隶。我们时代的历史任务正在于用合理的计划代替未被监督的市场作用；在于驯服生产力，强迫它们谐合地一齐工作，并顺从地服役于人类之需要。只有在这一新的社会基础之上，人才能舒展他疲倦的肢体，使每个男人及每个妇人，而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少数，都能在思想领域中变成一个完全的公民。”
>
> ——《保卫俄国革命》(1932)(中译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收入《里昂·托洛茨基演讲集》(*Leon Trotsky Speaks*)(1972)

这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未来观，是同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的。

无政府民粹主义的秘方……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用以同新自由主义对立的，是“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的概念。这个术语及

U.S. Navy

2006年6月，参与在亚太地区进行的“英勇之盾”大规模军事演习的美国战舰。美帝国主义为配合其针对中国和北朝鲜的军事压力，在环太平洋地区加强了部署。

Li/Liaison

在中国东莞，工人在生产耐克鞋。

其概念完全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社区”是一个旨在模糊社会阶级分界和利益冲突的常规资产阶级术语。特别在中国，使用“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的概念，就模糊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异：而后者是以占有和售卖商品为收入来源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农民的物质利益，在于以比他们进行生产(如化肥、农具)和个人消费而购买的工业产品的更高价格，出售他们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此外，农民这种高价出售粮食的利益，并不会随着家庭农场改造为农业集体而消失。农业集体成员的收入——不管买家是政府采购机构还是私营市场——仍大部分取决于农产品的卖价。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尽管公开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其实更接近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民粹主义。他们关于“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的见解同那个和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冒险家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有牵连的；主张由政治上自治的、经济上大部分自给自足的公社联合成联邦的典型纲领有相似之处。这从他们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批评的性质可以看出来。他们断言当时经济的过度集中是没有效率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含蓄地将集中计划经济同政治独裁等同起来：

> “经济计划变得过度集中了，而随着经济结构越来越复杂，经济计划再不能有效和有效率地反映人们的需求……
>
> “在继续发展中国过往成就的各种优势的同时，通过创立新的决策和规划架构授权给工农，是一种紧急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其中一项条件，就是改组和分散经济和国家决策的权力，来加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他们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直接控制。”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谴责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所带来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然而，要使不同企业、工业和地区达到同一水平的工资和福利，就必须要有一种集中管理的经济。只有这样的一个体系，才能实现经济资源从生产力较高的、向生产力较低的企业、工业和地区的再分配。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在长约150页的《中国与社会主义》以及对利皮特等人的答复中，都没有解释他们主张的“以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经济”，实际上会是怎样运作的。他们在大部分时候，只是将这个公式作为消除新自由主义种种罪恶的咒语来使用。在提出“建立一个全国的医疗保健制度”的假想例子时，他们有这样的解释：

> “[建立一个全国的医疗保健制度]需要发展建造诊所和医院的建筑工业、治疗疾病的医药工业、生产仪器设备的机床工业、保存记录的软件工业、培训医生和护士的教育制度等等：这一切都是由人们在地方、地区和全国的层次里，发展中的需要和能力所形成的。”

他们在文中完全没有指出，要实现这值得赞赏的目标，究竟哪些政治制度和结构性的经济机制是必要的。同其它需求相比(如在扩展工业和基础建设、军事防卫、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投资)，医疗保健制度开支占全部可用的经济资源的份额该如何决定？在建立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过程中，对各种经济活动(如建筑、医疗设备、计算机软件)的协调，需要集中的计划和管理。集中计划和管理同工人在生产线上的积极民主参与是**完全相容**的；例如，对技术最佳应用的建议、建立和执行安全标准以及维持劳动纪律等等。总体经济资源在各种互相冲突的需求之间的分配，应交由以无产阶级民主(即工农委员会的统治)为基础的政府的最高机关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民主是计划经济合理运行所必需的。

.....和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

利皮特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是以斯大林统治之下的苏联作榜样的，而且“不论中国或苏联，都没有一点工人监督的痕迹。”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对此并无异议。但“改革”前的中国吸引他们的，是晚期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些内容，特别是和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相关的那种浮夸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为了清洗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中国从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起来的那一翼官僚，发动了名堂荒谬至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是一场以后院炼钢炉为标志的、企图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疯狂冒险，结局是全面崩溃和大范围的饥荒。在文化大革命的毁灭狂潮中，在同官僚主义和所谓“走资派”进行斗争的名义下，几百万学生被动员为红卫兵。在1967年1月，上海工人配合全国铁路罢工组织总罢工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派遣红卫兵镇压了罢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的物质利益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态度。“社会主义建设”则被定义为对群众社会心理的改造，使他们以集体的福利为依归(即“为人民服务”)。当时一个毛派分子被广为传播的信条是：“我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为自己规定**高的**政治水平和**低的**生活水平。”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并不认同这种“社会主义的”禁欲主义。但他们的确把社会主义意识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经济匮乏被克服和物质富足的实现分割开来，从而实际上将技术的进步同人类的平等发展**对立起来**。他们在给利皮特等人的答复中声称：

> “人类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里，并非单单在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和消费品的丰盛基础上才能付诸实行，而是大多在阶级斗争之中和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这里说的阶级斗争指的是为消除一切生产条件的异化现象(即使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同时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所进行的长期斗争。”

值得注目的是，他们在这里将提高生产力和增加消费水平同**资本主义**发展等同起来。与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不将阶级斗争同提高社会生产力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是推翻**限制**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制度，并以国际一体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代之。后

Burke/Life

上：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中国革命粉碎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下：1951年，在朝鲜开城行军的中国部队。在1950-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保卫了北朝鲜。

UPI

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均享有充裕物质和文化资源、得以全面地实现他们潜能的世界共产主义文明。

《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之首先在《每月评论》发表，像口头禅常说，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早从1960年代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 主政的时期开始，《每月评论》就长期是美国毛派和亲毛左翼知识分子的头号刊物。斯威齐宣称“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了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非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每月评论》1974年11月)

利皮特同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两人目前争论的整个框架：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某种形式的伪平均主义、闭关自守的国民经济之间选择，根本是错误的。对毛泽东来说，“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教条，只是一个将迫不得已的事情说成是美德的典型斯大林主义措辞。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意味着一个建立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的、没有阶级的平等社会。社会主义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实现的概念，是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为了在全球的范围内调度生产资源，社会主义需要国际的计划经济。实际上，中国的“一国社会主义”，和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的苏联的一样，都意味着反对国际工人革命的展望和全面地同世界帝国主义调和。

在1950年底中国加入朝鲜战争时，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如日本)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禁运，禁止向中国出口广泛的一系列工业产品，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包含精密技术的设备。这项禁运在此后维持了二十年。在1950年代期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贸易促进了中国经济(实现了与现在同等的增长率)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大型现代工厂设备的建设。然而，随着北京和莫斯科两地的民族主义官僚层裂痕的加深，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在1960年代初中断了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就是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和他的理论家们才将“自力更生”(即闭关自守的国民经济)的美德宣扬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

然而，当中国在几年后同美帝国主义结成针对苏联堕落工人国家的战略联盟时，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是以1972年美国战机轰炸北越时，毛泽东拥抱美国三军总司令尼克松为标志的。北京同华盛顿的联盟，在1979年中国入侵越南时以鲜血被确认。作为回报，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开放了市场和供应来源。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五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部分是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尽管在非常低的基础上开始，增长了超过两倍。然而，中共还是维持了“自力更生”的意识形态姿势。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譴責中国过去几十年采取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诚然，他们坚持他们并不反对外贸本身、而只反对资本主义利润规律支配的外贸：“工人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出口生产本身，而是没有不同于**由利润驱动**的出口行为的选择——那些满足人类发展需要的选择。”(原文的着重)然而，中国是在一个由资本主义企业、银行和国家支配的世界中存在的；因此其出口活动就必然地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规律的约束。

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反对中国通过同西方和日本企业进行贸易和成立合资企业，而同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广泛经济关系本身。在中国，一个由列宁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领导的、以工农委员会为基础的政府，将试图利用世界市场加速经济发展。在实行这项政策时，政府将重新建立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制，并重新谈判外国投资的条件。最为根本的是，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府将**积极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在过去和现在——的真正罪行，是它不但助长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延续，还确实地巩固了它。在冷战最后的二十年期间，毛泽东和邓小平之下的中国，都在美国率领的反苏联盟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对苏联的反革命毁灭，这次国际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应承担直接的和不小的责任。

在后苏联时期，中共政权继续同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和企图调和。胡锦涛政府因此一直支持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美国不论侵占伊拉克和阿富汗，还是现在对伊朗(中国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进行军事威胁，“反恐战争”都是它的政治理由。此外，北京同华盛顿和东京勾结，以中间人的身份促成了旨在制止北朝鲜开发核武的所谓“谈判”。任何削弱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反抗帝国主义黩武行径自卫能力的行为，将会为中国带来同样的损害。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在抱怨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关系时，完全没有提及这些中国斯大林主义官

僚层——从毛到邓以至胡锦涛——对国际无产阶级犯下的真正罪行。同过去和现在的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截然相反，为了创造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打倒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手段，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最先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锻造共产国际。

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在《中国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最初以长篇文章的形式发表于《每月评论》2004年7月－8月)一文中，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只有很少的一些评论。而这些仅有的评论却偏偏是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他们承认“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中国人民还远远没有得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承诺”。但因为他们的主题之一是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了，他们明确地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不仅与今天的中国有质的不同、还比它优越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批判的亚洲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37卷)对维克托·利皮特的答复中，他们写道“中国离开社会主义的趋向”。

对利皮特来说，他在《批判的亚洲研究》(2005年第3期，总第37卷)刊载的讨论《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圆桌会议中主张：“这样的一个制度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我倾向用‘国家主义’这个词汇来形容它”。此外，他还断言在目前的历史时期，特别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和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一样，利皮特并没有解释他的社会主义的涵义。但从文章的脉络可以知道，利皮特所指的显然是某种接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东西：一个劳动生产率已达到足以克服经济匮乏的水平的社会。

尽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宣称自己的立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上的，他们显然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对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有任何用处。然而，卡尔·马克思正是为了阐明一个仍以经济匮乏和不平等、差别工资劳动和强制国家机器为特征的后革命社会，而展开了这个概念的：

>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著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 ——《哥达纲领批判》(1875)(原文的着重)

显然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同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后期展开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概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国际上孤立的、官僚统治的工人国家，它是在经济落后、又面对更强大的敌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存在的。

众所周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将最早在西欧发生，然后扩展到北美。因此，他们想象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向社会主义和谐过渡的时期。然而，从1917年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实现开始，历史的实际进程，比他们设想的更为复杂和矛盾。尽管如此，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从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单单在俄国一国建成。事实上，从创立第三国际开始，他们为在世界各地打造革命工人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国际斗争，倾注了全部精力。

然而，国际革命的失败、特别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败北，和年轻的苏维埃工人共和国的日益孤立，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带来的严重破坏，为民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1923-24年开始，苏联在约瑟夫·斯大林愈发暴虐的统治下经历了官僚民族主义的堕落。尽管如此，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仍对世界帝国主义起了部分的制衡作用，因此使1949年的中国革命及其产生的官僚畸形工人国家的巩固成为可能。在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统治者不仅威胁、还确实考虑过动用核武器打击红色中国。他们没有这样做，主要是惧怕这会挑起同拥有核武的苏联的战争。

1949年中共领导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指人民解放军——译注]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胜利，摧毁了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军事机关。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蒋介石及其党羽带领残余的武装力量逃至台湾岛。新的中共政权立即确立了它在政治权力和组织方面的垄断地位。由此，中国资产阶级被剥夺了政权，而经济在几年后被国有化。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一切从事独立政治活动的尝试都被中共政权无情地镇压下去。毛泽东及其同伙，开始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和政治架构都以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为榜样的国家。

毛泽东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现实

在1960年代，毛主义以其平均主义的号召、群众运动和以道德替代物质刺激，吸引了世界各地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重复了这种态度，尽管他们比上一代的西方毛派知识分子(如保罗·斯威齐)，对毛泽东的中国有更加多的批判。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描述为“实现了全民就业、基本社会保障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普遍平等。”

当然，相对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类的亚洲资本主义新殖民地诸国，中国的收入分配确实是平等得多。但中国不但没有超越同时期苏联的平等水平，还事实上在某些重要方面比后者不平等。在50年代中，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国有企业的工薪结构，并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维持了这个制度。最高的管理人员薪级和最低的工人阶级薪级的对比是15:1。此外，和苏联一样，中国高级党政干部、企业经理和同类人物，不但可以、而且的确以种种形式的腐败和寄生行为来补充其正式收入。

Li Zhensheng

1966年9月，红卫兵羞辱政府官员。毛泽东针对在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中的竞争者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中国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的鸿沟，并非始于邓小平推行的市场导向“改革”。城乡差距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就已经非常显著。在1952年到1975年间，同乡村劳动者仅有的41%比较，非农业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了83%。(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来发展的探索》，1987年版)在1980年(“改革”时代开始的一年)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比农村公社社员高60%，并比后者多吃近两倍半的肉类。在消费品(如手表、缝纫机、收音机) 占有的方面，则存在更大的差距。总的来说，中国城市的平均消费是乡村的两到三倍。

相比之下，苏联在19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城乡人口生活水平的差距有相当可观的**缩窄**。当时，一大部分的集体农场自愿改造为国有农场，其工人接受的划一薪酬和福利，并不随农业产出和政府采购价格而波动。到1980年代初，苏联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以比工厂和办公室工人更快的比率增加。苏联当时可以实现这种更大程度的平均主义，正是因为它当时已达到了远高于中国的生产率水平。

毛泽东时代中共官僚层采取的经济战略，基本上同19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相似。当时为实现经济剩余的最大化，工农的消费水平被压抑，剩余集中投资重工业。在1952年到1975年期间，工业的年均增长达到了11%。在1952年，工业产出占中国净物质产品的20%；到1975年，这一比率增长到45%。毛泽东时代建设的相当可观和相对现代的重工业部门，为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实现的高经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的总体改善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工业投资的高度资本密集性质，限制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扩张和农民社会比重相应的降低。在1952-1975年间，非农业人员占全体劳动力的比重仅从16%增加到23%。

到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当局的经济战略在造成大众的不满的同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障碍和矛盾。从1950年代中，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每年仅提高1%，这大部分是官僚主义指令的无能造成的。为抵消这一状况，国民总收入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被投入重工业，以致重工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从1950年代中的24%上升到1970年代初的33%。用于工业扩张的大量经济资源，主要是通过重税和以人为低价强制征收谷物和其它农产品的手段，从农民那里榨取出来的。除此之外，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事实上被冻结了二十年。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虽然大体上相当赞同毛泽东的中国，仍然承认这个事实：

> “在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损害的同时，[政府]为了维持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提高了积累率。没有生产率的真正增长，这些高积累和投资水平，是不太可能在不增加人民贫困的前提下长期维持下去的。”
>
> ——《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调查，1978-1994年》(1996)

在他们对“改革”时期中国的谴责中，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给予国企终身雇用制的废除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把它说成是走向他们想象中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步骤。他们在对利皮特的答复中写道：“这种物质上无保障的状况，正是资本主义对工人及其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的本质。”

无疑地，中国工人将终身雇用和劳保制度(所谓“铁饭碗”)看作是1949年革命的一项主要的社会成果。然而，在一个贫穷和经济上落后如中国的国家，显然既不可能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国企工业的就业，更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那种保障终身雇用、工资福利水平相当于农村公社社员两至三倍的职位。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禁制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此外，当局并不为日渐增加的城市劳动人口的全体提供国有部门的就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700万的城市青年毕业后立即被运送到乡村公社，被强迫同家人和朋友分离。假如这些青年有留在他们居住的城市、做任何工作的选择——即使是没有终身雇用保障、而且工资比一般人低的工作，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认为会有多少人宁愿到集体农场干活？到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农村公社成为隐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巨大储藏所。

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目的，是以冒牌的“社会平均主义”的名义来削减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而且，一个在**特定的企业**的终身保障雇佣制度在经济上不但不合理，还会逐渐成为通过更新投资促进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障碍。当时中国大部分的工业厂房设备是在1950年代中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五年计划期间建造的。这一计划的成果是当时中国通过苏联获得的最先进技术的体现。但到1970年代，很多工业企业在技术上已经过时。在一定的投资水平下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化，必须以新企业取代一些旧企业，或在旧企业重新装备新的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特定的现存职位将会被淘汰。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会以相当于旧岗位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重新雇用失业工人，并由国家全资安排迁移和再培训。当然，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们没有这样做。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被迫自谋生计，当中很多人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毛泽东政权通过官僚指令和警察国家的镇压手段，事实上将实际工资冻结了二十年。

邓小平开始的市场导向改革，是企图在斯大林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框架内，解决官僚指令经济效率低下问题的一种尝试。正如我们在1980年代所描述的：

> “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之内，存在着一个以市场机制取代集中计划和管理的内在趋势。由于不能以苏维埃民主(工人委员会)的纪律约束管理人员和工人，官僚层越来越将以市场竞争的纪律来控制各个经济参与者的办法视为解决经济效率低下的唯一答案。”
>
> ——《通过苏维埃民主实现中央计划经济》，《工人先锋报》第454号，1988年6月3日。重印在《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1988年7月。（引自中文《斯巴达克思》第7号，2005年8月）

“改革”时代的各种矛盾

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尽管建造了一个相当可观和相对现代的重工业部门，仍是一个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80%以上的人民在乡村生活。当时的农业产出赶不上工业增长的速度是促成“市场改革”的一个因素；更确切地说，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率已成为迅速和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个根本障碍。今天，过半的劳动人口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和服务部门工作，而全国人口的40%已城镇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发展**。中国工业能力在质量上相应的扩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与此同时，北京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者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使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加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滋长了同中共官僚及海外华人资产阶级有亲戚和金钱关系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并产生了一个富裕和享受西化生活方式的管理人

Magnum

在美国狂轰滥炸越南之时，毛泽东欢迎帝国主义战犯尼克松。

员、专业人士和技术官僚阶层。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两人同利皮特代表了这一矛盾现象的两个极端。前者为了证明中国劳动人民的状况在全面恶化而挑选证据。他们指出了明显而持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城市失业的增长，公共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的恶化。而利皮特则为了相反的动机而选择了证据。他指出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大部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尽管各个阶层的改善程度是十分不平均的)。利皮特引用了一些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数以亿计的农民因政府的政策而脱离了贫困的研究。

不论在《中国和社会主义》及其对利皮特的答复中，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都没有引用那些俯拾即是的、说明工人阶级经济状况改变的基本尺度的统计数字。在1979-1998年期间，制造业工人在价格调整后的年均收入增长达4%。仅在1988年和1989年，由于当时通货膨胀率异常的高，收入才出现了负增长。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在1999-2002年期间，工资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2%。在过去几年，一些主要的工业中心，如深圳和上海，竟然开始经历劳动力短缺，尤以技术工人居多。结果，为了吸引工人，雇主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一位在华尔街银行高盛供职的经济师梁红评论说："我们正在看到中国极度廉价劳动力的黄金时代的终结。"(《纽约时报》2006年4月3日)

然而，尽管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中国工人阶级各个部分的生活水平并非都得到了改善。事实是恰好相反的。从1990年代中开始，中小型国企工业往往以贱价卖给管理人员的方式被私有化。企业私有化、合并和倒闭造成的结果，大约有2000至3000万的工人被解雇，其中妇女比例失调地占多数。那些(主要在私营经济)找到新工作的人，已是幸运的少数，但他们还要面对薪酬降低和失去大部分或全部在国企工作期间得到的广泛福利的状况。

受国企倒闭影响而经济上特别遭受破坏的一个主要地区，是一大部分老旧工厂设备的集中地，东北的"铁锈地带"。在这里，多达40%的工人阶级失业。整体上，失业率被估计为城市经济活跃人口的6%-1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个指导经济政策的政府部门，推断今年如有8%的经济增长，中国将额外产生1100万个就业机会。这还不到官方发表的城市失业人员加上新增劳动力共有2500万人的一半。(伦敦《经济学家》2006年3月25日)

城市内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改革"时期不断扩大，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除了新兴的富有资本家阶级外，中国城市现在还有一个生活水平大体上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类人相当的、显著的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阶层。与此同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城乡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了3.2:1的比例。

这些统计数字不应掩盖农民状况在某些重要方面，同时得到了显著改善的事实。在1978-1997年间，农村地区电力的消费几乎增长了八倍。现在大部分的农村家庭都拥有一些家用电器。利皮特指出，到1997年时，三分之二的乡村家庭已至少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一种接触现代文化生活的基本手段。

然而，在其它重要的方面，农民的状况恶化了。毛泽东时代的乡村公社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中小学教育，养老金和其它社会项目。在1980-1983年间，邓小平政权解散了公社，以持有土地长期租约的家庭农场(即"家庭承包经营制")取代之。以前由公社提供的社会项目，现在理论上由地方政府接管。但在中国政府财政极端分散的现状下，农村地区乡镇的贫乏税收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农民家庭不得不自掏腰包来支付子女医疗和教育的费用。这种情况的社会后果是可以预料的：

> "尽管中国在提供接受教育机会方面取得值得赞赏的进步，一些严重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乡村远远落后于城市，而中国的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学校之间的素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受教育机会的差距，则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而扩大。
>
> "城乡以及不同地区的居民之间的健康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乡村儿童和母亲的死亡率是城市的两倍……所有指标都显示城乡儿童之间在营养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
> ——《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英文版)

在农村，官方所称的"群众性事件"(即骚动)有急剧的高涨。这些农民抗议和暴动，针对的不是地方官员在没有经过合理补偿的情况下没收土地，就是武断的征税、腐败和其它官僚主义弊病。胡锦涛政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下，承诺改善农民状况，对此作出回应。农民的税务负担被减轻，许多农村学童的中小学学费将被免除，中央政府同时计划在农村投入更多款项从事社会项目和投资基础建设。然而，正如《经济学家》(2006年3月11日)所指出的：

> "这些措施并不预示任何重大的政策转变。中央政府在农村的开支仍将仅占政府总开支的8.9%：这比去年的8.8%有所增加，但低于2004年的9.2%。废除农业税和其它对农民开征的费用每年将平均节省每个农村居民156元——大约净收入的4.8%。"

真正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需要经济资源大规模的再分配和再配置。在农村引入现代科技——从联合收割机、化学肥料到科学农业的整个体系——将需要一个质量上比现存水平更高的工业基础。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将提高对大规模扩展城市的产业就业、以吸收农村广大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显然地，特别在当前中国工业基础规模依然有限和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前景进展的速度及其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将取决于社会主义日本或社会主义美国对中国的支援。这再次突显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无产阶级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争辩说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革"时期里恶化了，他们这个立场的关键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的。他们谴责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在中国的发展，并认为这是资

Jean Weinberg

里昂·托洛茨基的1936年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对十月革命在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统治下经历的堕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图为中国托派在1939年出版的此书的中译本）

本主义的“复辟”。在这里，他们的无政府民粹主义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和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异的立场直接地对立起来。他们在对利皮特的答复中，以赞同的态度引用了有份参与《批判的亚洲研究》上关于《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的讨论的左翼学者吕大乐的这个陈述：“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真正无产阶级化。经济改革使他们真正地被市场支配，并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他们分割开来。”

将“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复辟等同起来的吕大乐，在描述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庞大增长，是随着他们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分离而发生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意思？除了工业的私有化外，他所指的大概是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人隶属的农村公社的废除。这些农村公社基本上是由使用劳动密集手段和较原始技术的落后小农场凑合而成的。即使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比邓小平及其继承者统治的时期较为平等，这亦只是一种在压倒地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的、贫穷的平等。

回顾卡尔·考茨基在1899年撰写的《土地问题》，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民的一大部分转变为无产者的历史意义是有帮助的。列宁认为这本书是对了解现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考茨基后来的右翼修正主义和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敌视并不能否定其早期著作的价值)。毫无疑义的，考茨基描述的十九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的阶级性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根本的差异。尽管如此，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无产阶级化造成的各种社会影响，还是同这个过程有对应之处的。正如考茨基所描述的：

> “工厂通过集中分散的工人，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通过发展交通系统、将知识上较发达的工人从城市带到村庄，它拉近了工厂村庄和外部世界的距离。因此，这是使部分农村人口接近城市无产阶级、逐渐地唤起他们对后者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兴趣和认识的一种手段。而最终，在有利的条件下，这将使他们得以参与这场斗争。”

事实上，来自乡村的外来工人［到城市工作的农村人口］已经站在了最近的中国工人斗争的最前线。在东南沿海，许多年轻的外来妇女以罢工或其它手段拒绝在血汗工厂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从而造成了2004年夏以来的严重劳工短缺。在上海和北京，占蓬勃发展的建筑业的劳动力达百分之八十的外来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了成功的斗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中国放宽了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的限制，但限制本身并没有被废除。被迫从事最危险和卑贱的工作的外来人口，不但没有合法城市居民的权利，还往往被强迫住在隔离的区域。许多城市工人鄙视外来人口，认为他们抢走了工作、压低了工资。在今日中国，一个革命先锋党会为团结工人阶级的所有部分，并与农村劳动者和城市贫民结成联盟而斗争。为外来人口争取和合法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包括获得医疗、住房和公共教育的权利，以及同工同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展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自由主义者利皮特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之间关于中国和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双方的立论都是建立在一个根本错误的框架之上的。在经济上，双方都否定了资本主义是阻碍生产力全球发展的桎梏、而生产力只能在国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在政治上，双方都否定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展望，这条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解决匮乏的必由之路。

托洛茨基在其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堕落的开创性研究《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中，引用了这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作出的评论：“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匮乏就会普遍化，而如果出现匮乏，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又要开始，而这就意味着，一切旧的欺诈行为[马恩著作中为‘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译注]必然复活。”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指的是阶级压迫、不平等和剥削。斯大林主义者们断然否定了这个唯物主义的认识，宣扬只要挫败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社会主义便可在一国之内建成的白痴主张。斯大林主义者这样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便是他们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在苏联，这种背叛的最终结果，是灾难深重的资本主义反革命。而在中国，斯大林主义的苛政则造成了一个充斥着各种矛盾和社会不满的社会。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展现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得来的巨大优越性的同时(这种优越性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远远高于印度一类资本主义新殖民地)，也显露了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带来的深刻恶果。这些恶果包括大幅度增长中的不平等，与寄生官僚层紧密相连的新生资产阶级势力的滋长，和将摧毁中国工农大众成果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威胁的逼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锻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领导庞大而有巨大力量的中国工人阶级站在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最前列，进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12月版［根据1937年英文版翻译］)中写道的：

> “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评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在工业中实行民主意味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修改计划.....‘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将被限制于严格的必需范围以内，并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逐步让位给社会主义平等.....青年将有机会自由呼吸，进行批评，容许犯错误和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摆脱自己的锁链。最后，外交政策将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